

013896

当代外国 政治书摘

第二辑

共运风云

〔南〕马罗维奇著

共产党国际主义现状

〔美〕劳·惠顿编

苏共二十大日记

〔意〕维达利著

印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及其经验教训

〔印〕班纳吉著

里斯卡模式——构想与评论

〔匈〕斯卡拉伊编

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书介）

《在克格勃的三十年》等（书讯二十五则）

当代外国政治书摘

第 二 辑

東方出版社

封面设计：倪天鹏

当代外国政治书摘

DANGDAI WAIGUO ZHENGZHI SHUZHAI

第 二 辑

1986 年 7 月第 1 版 198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850×1168/32 10.75 印张 256,000 字 0,001—2,950 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东方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书号 3453·12 定价 2.10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书 摘

- 共运风云……………〔南〕马罗维奇著 (1)
- 共产党国际主义现状……………〔美〕劳·惠顿编 (45)
- 苏共二十大日记……………〔意〕维达利著 (74)
- 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问题
——回顾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英〕高兰著 (110)
- 印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及其经验教训……………〔印〕班纳吉著 (168)
- 希腊将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美〕马克里迪斯著 (193)
- 里斯卡模式——构想与评论……………〔匈〕斯卡拉伊编 (226)

书 介

-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和波兰的经验》……………杜家起 (270)
- 阿尔都塞论文集《列宁和哲学及其他》……………杜章智 (283)
- 《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吴良健 (292)
- 《红旗在阿富汗上空飘扬》……………张春风 (296)
- 马克思学说在拉美的命运
——介绍《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林爱丽 (306)

书 讯 (二十五则)

- 赫伯特·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314)

体制与危机 (315) 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化
 (315) 伊斯兰教:世界社会的宗教与政治生活
 (316) 印度尼西亚政党的进程——一幅时起
 时落的图象 (317) 菲律宾新宪法与政府详解
 (318) 一个大使的生活和意见——在河内
 (318) 印度的土地改革/印度农村发展和社会
 关系的变化 (319) 阿富汗的革命和反抗 (320)
 第二共和国与韩国的民主主义 (321) 灾难的
 年月: 1975—1976 年的黎巴嫩/愤怒的年月:
 1977—1982 年的黎巴嫩 (322) 贝京以后的以
 色列 (323) 波兰:革命的起源 (324) 反革命
 中的反革命——阿尔巴尼亚对波兰 1980—1983
 年大事的分析 (325) 在克格勃的三十年——
 休·汉布尔顿的双重生活 (326) 工人阶级的
 经历 (326) 前非统秘书长迪亚洛·泰利之死
 (327) 埃及社会与政治:利益集团在埃及政权
 中的作用 (1952—1981 年) (328) 论伊斯兰和
 共产主义 (329) 桑给巴尔的解放斗争 (330)
 非洲传奇 (330) 墨西哥革命的破产:通货膨
 胀—货币贬值—贪污腐化—假民主和宪制的神
 话 (331) 委内瑞拉历史演变中的政党 (332)
 哥斯达黎加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333) 巴西
 的游击战 (334)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书目(二) (335)

书 摘

共 运 风 云

〔南〕米奥德拉格·马罗维奇著

王 森摘译

《共运风云》(原名《斯大林主义的破灭》)一书是南斯拉夫著名记者、政治评论员米·马罗维奇所著,1978年由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自由》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四部分,十三章,中文约五十万字。

本书详尽、系统地描述了自1955年赫鲁晓夫访南、南苏关系开始改善直至1978年铁托总统访华、中南关系开始改善这二十多年来国际共运和工运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如南苏冲突与和解、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苏联侵捷事件、中苏冲突等)、各党之间的分歧和关系的变化、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党内的重大变革、共运的分裂以及历次国际共运会议和各党代表大会上以及会下的争论。书中着重围绕南苏冲突、中苏冲突、西欧各党和其他许多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与苏共之间的冲突、矛盾和分歧以及展开的论战,阐明了多年来共运中以苏联为一方,以其他多数党为另一方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霸权与反霸权之间的激烈斗争。

本文是该书第一部分《动荡的年代》的第三章,主要

评述和介绍了1956年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所谓1957年的克里姆林宫政变的情况。

多年之后，许多人把1956年称为命运攸关的时代或转折时代。在这一年之中，种种风云事变、破裂和动荡层出不穷。正如法国女记者多米妮克·德桑蒂在其著作《斯大林主义者》一书中所说：“在这个原始森林中，每时每刻都确实步履维艰。”

波兰的十月

这年6月，在闻名的博览城市和工业城市波兹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恰恰在有西方厂家参加的工业博览会开幕前夕，在波兹南斯大林车辆厂发生了罢工。一个工人代表团来到华沙。政府同工人代表进行了谈判。工人代表要求改善工资制度和奖金制度。国家代表只是部分地接受了工人代表们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武力镇压可能出现的反抗。当时在那种被宣布为没有冲突的社会制度下，罢工是不可想象的。其实，当时社会中长时间以来就已经沸腾到表面了。

愤怒的工人们走上市内大街，他们之中有妇女和儿童。工人们以12人为一排，秩序井然地列队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面包、民主、自由！”还听到有人喊道：“打倒官僚！”“打倒沙龙口号！”“我们要行动，不要许诺！”数千名群众发出呼吁：让1949年被撤职并很快被逮捕和受到审判的领导人重新领导党。“维斯瓦夫！”“维斯瓦夫！”的喊声响彻市内街道上空。“维斯瓦夫”是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绰号。

但是并非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一部分人成群结队地向弹药库进发，另一些人奔向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并发给了他们武器。

接着，强大的警察部队开上街头。开始射击起来。坦克也出现了。后果是骇人听闻的。据最初的官方消息：死亡38人，伤200人左右。后来又有几十人死亡。300多名游行示威者被捕。

游行示威虽然被镇压下去，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消息闪电般传遍了波兰。工厂罢工、游行集会遍及全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反应：西伦凯维茨总理赶到波兹南。

官方新闻工具把这一切都说成是西方的挑衅和“流氓闹事”。国家领导人对国内的普遍愤怒情绪熟视无睹，依然诉诸武力。

然而，反响是巨大的。沸腾仍在继续。面对这种局面，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举行了七中全会。全会宣布，这并不是“西方的阴谋”，“波兹南事件的根源在于经济困难和过去一个时期的疏忽，在于党和政府在过去时期内所犯的导致党同工人阶级中断了联系的错误，在于党的机构和领导的官僚主义”。中央委员会支持关于使工人对生产管理建立更大影响的要求。授予工人委员会讨论涉及企业的物质地位、劳动条件和制订计划的全部问题的权利。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保持“一长制”，即保持经理作为国家代表的不可侵犯的牢固地位。

这是一种勉强的妥协，这种妥协未能使国内煽起的政治运动平静下来。1956年9月向工人们公布了工厂委员会法案后，劳动集体中又沸腾起来。工人们提出在企业中建立新的工人机构的要求，这种工人机构的权力应比法律规定的权力大得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讨论起来。人们公开提出，把1948年波兰党内出现的转折称之为“民族主义右倾”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化的表现，现在必须使整个政策来一个更有力的转折。

但是，领导人似乎并没有准备这样做。波兰领导人不去研究

国内动荡的全部深度，却试图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影响”来解释一切，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波兰领导中仍然保持其地位的斯大林主义一翼尤其如此。

铁托一次在评价波兹南事件时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说，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南斯拉夫人的过错。南斯拉夫人之所以有过错，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建立了现在这样的南斯拉夫，是因为它对其他人起到榜样的作用。甚至在人们不希望它起这种作用的时候，我国也在放射着光芒，而且是积极的和有益的光芒。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年6月波兹南所发生的事件，以及为什么后来将这一事件称为“波兰的十月”，让我们对波兰党内不久前发生的主要事件作一次简短的回顾。波兰党是1938年被共产国际解散的一个党，当时共产国际并发布指示：“任何想在这个国家建立新的共产党的企图都将被视为挑衅”。这项进行集体惩罚的决定在波兰共产党人中间引起的愤怒从来没有消失。（顺便提醒一下，我国党也曾遭到过同样的命运。当时这种决定已经准备就绪，但由于铁托在1937年为使因宗派斗争和驻在国外的领导人的有害活动而陷于分裂的党的队伍健康化采取了迅速行动，才阻止了这一决定的通过。）

1939年恰恰在波兰土地上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波兰党是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党，因此许多共产党人建立了“破坏小组”，他们加入了其他党，或者完全消极下来。只是到1942年1月才在华沙建立了地下共产党，后来它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同时在战争结束前夕，在莫斯科又建立了一个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这样就同时存在两个领导机构：一个是在1943年开始由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领导的国内领导机构，另一个是由亚历山大·扎瓦茨基领导的驻在苏联的领导机构。^①

战争结束后，在消除过去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支持工业化和建立牢固的行政管理—中央集权制过程中，在党的领导内部也开始出现冲突。还在1947年在讨论波兰社会今后发展途径时就出现了最初迹象，到1948年这一冲突变得更加尖锐了。

情报局决议的出现为以戏剧性的斯大林的方式解决分歧打下了基础：开始了逮捕、拷打、审讯。从苏联来的干部很快就具有了决定性影响。1949年初，在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哥穆尔卡和一大批“国内领导人”被指控为“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倾向”，并被赶出领导机构。一年之后，政治局委员斯彼哈尔斯基被捕。又过了几个月，哥穆尔卡本人也被捕。这是在外部影响下对波兰共产党人的第二次打击。这种打击不能不留下深远的后果。

这种斯大林主义的转折尤其损害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还在战争期间就形成的一定形式的工人参与管理企业的传统。实际上，波兰的工厂委员会是党在地下工作时期就自发产生的，解放后它不仅成了生产过程的监督者，而且也成了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者。但是，1948年工厂委员会被厂工会会议所取代，这样就导致前此许多支持党的人产生了消极倾向和不满。与此相反，在行政管理措施和强制性措施面前，宗教影响以及旧资产阶级政党的反社会主义的残余势力的影响开始增加。这使国内局势变得尖锐起来，而作为反措施，便决定压制一切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

斯大林逝世标志了波兰开始进行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加深刻的批判。1954年3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没有被人们很好地接受，尽管这一决定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家六年发展计划中的过度紧张状态。期望是相当大的，结果失望更大。随着失望

① 经过在波兰协商，两个机构进行了分工：瓦·哥穆尔卡掌管党的领导，亚·扎瓦茨基担任国家元首。1949年哥穆尔卡和其他官员被撤职并被捕后，波莱斯瓦夫·贝鲁特成为波兰头号人物，扎瓦茨基留任政治局委员。

又出现了呼声越来越高的批评，首先是在工会全会上提出批评，然后是在党的全会（1955年2月和3月）上提出批评。这些批评认为，造成不良状况的原因是“经济管理过度集中以及党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化”，并指出“领导人同劳动人民日益脱离”。

但是，无论是在波兰作为斯大林主义化身的波莱斯瓦夫·贝鲁特的逝世，还是苏共二十大，都未能使领导从死气沉沉之中转变过来。爱德华·奥哈布成了党的领导人。他希望进行一定的小心翼翼的改革，但没人支持他。

国家领导已完全分裂，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苏联人”（波兰人对从外国来的领导人的称呼）所领导的斯大林主义集团经常聚集在纳托林宫开会，企图对国内进程施加影响。根据这座宫的名称，他们得到了一个绰号——“纳托林”派。在当时的波兰，这种绰号即是斯大林主义者的代名词。

另外一批人主张恢复了名誉的党的领导人，首先是哥穆尔卡和斯彼哈尔斯基回到中央，主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并为恢复经济采取坚决措施。当时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比如，党的官方刊物在《人民论坛报》一会儿发表社论，谴责波兹南事件是“蓄意组织的外来挑衅”，而接着马上又发表另外的社论，提出不仅应该重新审查官方对波兹南游行事件的评价，而且还要求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改革。

在夏季的那些日子里党报写道，“波兰政府必须尽量做出一切努力，以便将来避免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生这类敌人随时准备利用的事件。然而，这不仅仅是工资正常化的问题，而是应该在目前的工业企业关系中实行深刻的民主化的问题，是必须让工人参与管理自己的企业的问题……”

有些文章还直接破坏了当时神圣的教条主义根基。《人民论坛报》写道，“我们波兰放弃了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阶

级斗争也会日益尖锐起来这一错误而有害的理论。诚实而勇敢地重新审查过去的错误,使生活民主化,加强法制,实行大赦,加强议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这一切都会使那些由不信任的壁垒同我们隔开的人们心悦诚服起来……”

然后举行了八中全会,这是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它使事态有了最终结局,并驱散了地平线上不祥的乌云。这发生在10月19日至21日期间,正是匈牙利悲剧的前夕。

波兰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波兰人总是喜欢说针对波兰的十分有趣的笑话。从1949年起波兰国防部长是一位波兰血统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①正是他领导着“纳托林”派。

在预定召开的党的八中全会前夕,“纳托林”派决定动用按照使波兰成为华沙条约的成员国的条约驻扎在波兰各军区的苏联军队,以对全会的工作施加压力。由于对立的集团采取了某种反措施,因此他们决定邀请苏联出兵干涉。

然而一夜之间消息传遍了整个华沙,并且很快传遍全国。这次被公开称为“罗科索夫斯基政变”的行动受到有组织的工人委员会的反抗。工人委员会宣布,他们将不惜流血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尤其是当群众听到,按照政变者的计划,目标之一是将再次逮捕哥穆尔卡并将把他立即处死。这时愤怒情绪达到

① 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也是1936—1937年间斯大林清洗运动的受害者之一。他作为将军被指控为“在军队最高领导层建立反革命集团”。罗科索夫斯基巧妙地证明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指出,在指控他的“原告”中有一个是在国内战争中失踪的军事领导人的名字。检察官书生气十足地把证明转交给法官。罗科索夫斯基在法庭上冷静地声明:不难证明这个人已经死了十五年了。就这样他保住了自己的脑袋,但最后还是被判了刑,直到战争前夕才恢复军职。战争期间在朱可夫元帅手下工作,担任集团军司令非常出色,因而荣获元帅称号。后被派往波兰,因为他母亲是波兰人。从华沙回苏联后同其他许多实际上退职的元帅一样曾担任苏军总参谋部顾问(根据苏联法律规定,元帅将终身保留自己的职务)。七十年代逝世于莫斯科。

一触即发的程度。他们知道，中央委员会将会考虑到人民的情绪，让哥穆尔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

关于军队调动的消息从内地传来时，工人纠察队已经占领了所有战略地点和整个城市。

成千上万的人们准备在华沙各个入口筑起街垒，以阻止坦克进入首都。

然而，中央委员会在预定的时间举行了会议。巨大的部长会议大厦也由工人纠察队守卫。表面上看来一切都很平静，但一切都剑拔弩张。它很可能酿成远比波兹南发生的规模大得多的大火。

不出几分钟，一百五十名中央委员已经作出决定：已经恢复名誉的老领导人——前总书记、副总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前国防部副部长、政治局委员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司法部副部长、中央委员和干部部部长泽农·凯伊什卡和工会联合会书记、中央委员伊格纳齐·洛加·索文斯基都回到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除索文斯基外，其他人都曾以各种罪名坐过多年监牢，几个月前才断定，对他们的指控是无根据的。

此后，一切都象影片一样一闪而过。全会日程规定爱德华·奥哈布就中央委员会会议议题作报告。但是，一个中央委员突然站起来，提议立即改选政治局。他并提出了应选进政治局的新成员名单：除了第一书记爱德华·奥哈布以外还列入了哥穆尔卡、洛加·索文斯基、扎姆布罗夫斯基、西伦凯维茨、腊帕茨基、芙德里霍夫斯基、莫拉夫斯基和扎瓦茨基的名字。十分明显，名单中没有“纳托林”派中某些最有名的人物，而且其中多数都是在国内建党的干部，而不是从莫斯科派来的人。

“纳托林”派对此异口同声地说：否。在等待展开激烈讨论时，会议执行主席奥哈布突然站起来宣布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

最高领导人已经到达华沙，要同波兰党领导人进行谈判。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颗炸弹。只听人们喊道：“是谁叫他们来的？”“同不速之客没什么好谈的！”“这是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应该把这消息告诉人民！”

奥哈布坚持休会，并确定同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进行谈判的代表团。苏联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本身说明，到波兰来的决定是在最保守的苏共中央委员的压力下作出的，这也就促使赫鲁晓夫推翻了他苏共二十大后不久就在华沙公开许下的诺言。赫鲁晓夫曾在波莱斯瓦夫·贝鲁特葬礼上说过，今后苏联和波兰之间将保持平等的关系，将尊重国家和党的主权。

中央委员会决定，除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外，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也参加代表团。这就保证了无法背着中央作出任何决定。

会议中断，参加谈判的人必须在下午六点钟将会谈情况向中央汇报。

代表团前往军用机场，苏联领导人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赫鲁晓夫板着面孔同过去会见时相识的政治局委员们互致了问候。然而，当他走到哥穆尔卡面前时，却问道：

“你们这位是谁呀？”

哥穆尔卡以平静而冷淡的声音回答他说：

“我是哥穆尔卡，我是曾被你们的警察关进监狱并想处死的人。不过正如您所看到的，我还活着，我会继续活下去。”

在冷淡和紧张的气氛中，奥哈布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央派他们来谈判，谈判可以立即在国务委员会驻地、座落在市中心的贝尔维德宫开始。

赫鲁晓夫把随身带来的一批苏联元帅也介绍给波兰领导人，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加重向波兰施加压力的力量。

但是，这并帮不了多少忙。

还在前一天夜里，工人们就占领了工厂。到处都举行了支持哥穆尔卡以及党的新领导的群众集会。一切都是在十分有秩序的、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党及时地发出警告说，任何失去控制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新的流血事件和苏联的军事干涉，这也是“纳托林”派所希望的。

工人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如下明确要求：

- 立即实行工人自治制度；
- 彻底贯彻七中全会关于进一步使生活民主化的决定；
-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 波兰党保持完全独立。

工人集会上通过的许许多多的决议中写道：

“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生死攸关地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决不允许将现在的斗争变成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企图”。

佩带着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到处警惕地维持秩序，保持安定。此刻整个波兰都在紧张而坚定地等待着同苏联领导人的谈判结果。

然而，谈判进行得并不轻松。赫鲁晓夫要求汇报波兰所发生的事情。他断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波兰占了上风，工人们受到了蒙骗。他说，在群众集会上流氓占了上风，正如在波兹南所发生的事件一样，流氓们将会破坏党和社会。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苏联代表团中其他人的态度更加尖刻。一次赫鲁晓夫甚至威胁说：

“我们的坦克将结束这场暴乱。”

哥穆尔卡对此坚决回答说：

“在这种情况下坦克碾压的将不是流氓和外国间谍，而是这个党的中央委员和波兰共产党员。”他接着说，“请不要忘记，你们将会遇到工人街的街垒，将会付出生命，我们的军队将按照中央委员

会的命令参加战斗，尽管罗科索夫斯基是军队的最高领导。”

下午六点钟，参加谈判的人回到了中央委员会开会的大厅。在此期间，在会议大厅和市内各联络点之间建立了通讯桥梁，人们正等待着关于谈判情况的消息。几乎华沙的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大学生和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学者都自发地聚集在工学院，整个城市和整个波兰都在等待着、期待着。

奥哈布向中央委员们汇报了迄今的谈判情况。他说，气氛有好转，但是还需要继续谈判。

十五分钟之后，波兰领导人又穿过市内主要大街——仍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去继续谈判。

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钟。

耐人寻味的是，看来，苏联方面已经相信，一切将会轻松地过去。还在谈判期间出版的《真理报》也证实了这一点。《真理报》是为向自己的读者以一定方式解释进行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的原因的。它攻击波兰报纸刊登“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宣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颠覆波兰社会主义”。这样就把这次突如其来的华沙之行说成是苏联领导人担心波兰会复辟资本主义。

波兰报纸立即对这种攻击进行了回击，说这种攻击是一种“与苏共二十大精神背道而驰的行为”。同时，这也是说一些其他话的机会。《人民论坛报》写道：“如果说今天波兰同志批评过去年代中波苏合作的某些形式的话，那么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反对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同盟，而是因为他们希望予以纠正的某些错误损害了这一友谊”。“这不是反苏行为，而是争取使这种友谊得到更加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发展、使这种友谊在平等、主权和真诚友爱的原则上得以加深和发展的一种行动。”

然而当时已经很清楚，赫鲁晓夫不得不从华沙空手而回。在凌

晨时分发表的简短公报以含混不清的语言表明，压力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客人们不得不对主人的解释感到满意：波兰所走的道路并不妨碍同苏联结盟，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但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两个困难的决定：签订一项特别协定以解决驻波苏军的地位问题，把不受欢迎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调回莫斯科。^①

这一切都由当时虽然还不是正式的、但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党的领袖的哥穆尔卡在凌晨举行的会议上向中央委员们全部作了汇报。局势已经大大改变，致使哥穆尔卡带有分析性的、鼓舞人心的和乐观的讲话代替了奥哈布的报告。哥穆尔卡的讲话受到整个波兰的欢迎，认为这是理智、现实和进步方针的胜利。

过了长时间之后，当人们再去读哥穆尔卡的讲话时，可以看出，在那种转折时期，这篇讲话仍然是一个体现为争取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的坚定理想的文件。同时从这个讲话还可以看出经过多年之后哥穆尔卡自己不得不再次走下政治舞台的原因。他同他的前任一样同工人们发生了冲突。工人们同要求他上台时一样，1970年也十分信服地要求他下台。十分简单，“维斯瓦夫”没有彻底贯彻他在1956年10月曾振奋人心地阐述过的纲领。犹豫不决和妥协使波兰工运中一个最高领导人成为无能为力的人物，他不仅在出现的情况面前惊慌失措，而且在狂热地支持五十年代曾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方面也表现得自相矛盾。

当时在八中全会继续工作过程中，哥穆尔卡用外科手术刀解剖了党和国家的病体：

“我对七中全会的决议有一些保留意见。这些意见涉及到对历史的评价以及党对农村政策的评价……我的保留意见也涉及到犯了错误并歪曲事实的那些人的责任问题……应该坦率地说，对糟

① 关于解决驻扎在波兰基地的苏军地位和行为的条约于1956年11月波兰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签订。当时还签订了多项关于两国间经济合作的文件。